

# 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基础: 伊斯兰文明

苏献启, 王红信

(邢台学院, 河北邢台 054001)

**摘 要:** 伊朗现代伊斯兰共和制政治模式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既有鲜明的传统主义特征(政教合一), 又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不断遭到西方社会的质疑, 也不断受到国外生活方式和普世价值观的冲击, 从而带来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伊斯兰共和制; 合法性基础; 伊斯兰文明  
**中图分类号:** K37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658(2010)03-0013-03

伊朗核能开发活动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当时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980 年美伊断交后, 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 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随后美国历任总统在伊朗核问题上都采取打压态度, 以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此问题上更是持高压政策, 以致 2003 年 3 月 20 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 外界普遍猜测美国下一个清理的对象将是伊朗政权。美国国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媒体都在舆论上大造声势, 质疑伊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实质上是质疑伊朗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我们认为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伊斯兰文明。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基础: 伊斯兰文明  
1978~1979 年, 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1979 年 12 月, 伊朗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伊斯兰共和制, 最高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

合法性 (legitimacy) 和权力的合法化 (legitimation) 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各有不同。哈贝马斯认为: “合法性意味着, 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 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sup>[1]</sup> 利普塞特则认为, “任何政治系统, 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 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sup>[2]</sup> 罗思切尔德也认为, “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 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 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 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sup>[3]</sup>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

以基于价值或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 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 这些均属于价值或情感合法性。

伊朗属于典型的伊斯兰文明国家, 要理解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要了解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精神, 也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即是穆斯林民族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感情、政治信仰以及政治价值取向的伊斯兰政治文化, 如果与西方政治文化相比较, 其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 伊斯兰文明确信一切权力来自真主, 一切权势全是真主的, 人只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 伊斯兰民主政治排除了统治者的特权并且将人民提高到与统治者平等的地位。因此, 伊斯兰民主中,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深层基础是真主的意欲、允许和委托, 其世俗的合法性则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信托和同意。同时通过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政治协商程序形成公共权力并建立公共管理机构。

其次, 伊斯兰文明中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通过运用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措施来实现和保障的。权力的运用者对真正的主权拥有者——真主, 在信仰上的虔诚、在心理上的敬畏, 构成了政治信仰和政治道德的核心, 成为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的深层因素。同时伊斯兰民主协商制度和民主监督程序在制约政治权力方面成为深层机制的外在延伸, 用以保证实际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力运行的顺畅和正当。

再次, 伊斯兰政治文明从它产生起就属于典型的参与型政治文明。每个公民都享有各种政治上的自由与权利, 承担法定的义务和责任。他们都能够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能够按自己的愿望直接地、自由地参与选举国家领导人, 能够批评政府决策, 等等。

[收稿日期] 2009-12-10  
[作者简介] 苏献启 (1960-), 男, 河北元氏人, 毕业于河北大学, 主任、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电话: 13323190388

目前, 伊朗政治制度架构基本上是在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精神上的, 也就是说, 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伊斯兰文明, 这在伊朗政治制度的特点上体现得非常细致。伊朗的政治制度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 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

根据伊朗宪法, 宗教领袖是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 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宗教领袖的权限包括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宗教成员、司法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 宣战或宣布停战; 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颁发总统委任状, 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来罢免总统等。宗教领袖通过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专家会议是选举伊朗宗教革命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 共有成员 86 人, 每年举行一次年会, 讨论国家大事及领袖的行为。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领袖。这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权特点。

第二, 建立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架构

伊朗政府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继宗教领袖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既是国家元首, 又是政府首脑。总统可授权第一副总统掌管内阁日常工作, 有权任命数名副总统, 协助主管专门事务。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四年, 可连任一届。伊朗内阁部长由总统提名, 需要议会审议通过。伊斯兰议会是伊朗最高立法机构, 实行一院制。伊朗实行一院制, 议会有权批准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 随时对总统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 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 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得到宪监会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四年。议长一年一选, 可以连选连任。

司法部门是伊朗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总监是司法方面的最高首脑, 由领袖任命, 任期五年。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由司法总监任命, 任期五年。司法部长由司法总监推荐, 总统任命, 负责协调政府和议会间的关系。在司法总监领导下, 还设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国家监察总局, 分别审理民众对政府机关的诉讼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

第三, 伊斯兰法是整个国家运行的法律规范

目前, 伊朗社会、政治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运行, 但伊朗国内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与伊斯兰教法和伊朗宪法一致。根据伊朗宪法, 伊斯兰议会为伊朗最高立法机构。为了保证议会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原则, 宪法还规定成立宪监会。宪监会共有 12 名成员, 其中 6 名是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宗教专家, 另 6 名是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经议会确认的法学家, 他们的

任期为 6 年。宪法规定, 宪监会有权审查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 监督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 并有权宣布任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法律无效。议会通过的议案必须得到宪监会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宪监会发现议会通过的议案与伊斯兰教义或宪法有冲突, 则有权送还议会修改。议会修改后, 再由宪监会审核批准。这样, 宪监会就确保了伊斯兰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地位, 有力地维护了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及三权分立的伊斯兰共和体制。

二、伊斯兰共和制合法性危机与伊朗政制发展趋势

从 1979 年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制到现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走过 30 个春秋。这 30 年里, 伊朗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伊朗政权却一直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包围中, 可以说一直处于夹缝中求生存。1993 年夏, 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繆尔·亨廷顿先生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 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亨廷顿认为, 冷战后, 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 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 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 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 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 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sup>[4]</sup>

目前,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普世价值观的冲突, 建立在这种普世价值观之上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力图用基督教文明改造伊斯兰世界, 建立西式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 而这种西式的政治构架和普世价值观并不被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伊朗所接受。但自 1979 年 2 月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 推翻巴列维王朝后, 伊朗宗教保守势力长期垄断伊朗政权, 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国内政治文化生活偏激、单调、枯燥, 宗教清规戒律森严, 极大束缚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把恪守伊斯兰教规视为革命坚定的象征; 对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业设置重重限制, 不准国民收看西方影视、书刊和举办音乐会等; 妇女出门必须用黑纱披罩全身, 在公共汽车上男女分座; 禁止男子追求女学生, 甚至禁止饮用外国饮料等等, 这使青年人、妇女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厌倦和反感, 正如一女青年在大选投票后所说: “伊朗需要更多的自由, 目前太严厉了”。<sup>[5]</sup>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伊朗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伊朗人尤其是年轻的伊朗人都普遍接受西式的时尚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规范与世俗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严重冲突,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下转第 18 页)

“惟入此者美人绝少，大都意大利、犹太、中国之人为多耳。”<sup>[4] (P<sub>95</sub>)</sup>郭嵩焘在香港监狱参观亦看到同类现象，该狱“所收系有西洋人，有吕宋及印度人，通计三十馀名，而中国至四百七十四人。”<sup>[3] (P<sub>32</sub>)</sup>纵有人口基数因素在内（据郭嵩焘日记，当时香港人口十三余万，西人即有六千）<sup>[10]</sup>，这个比例也是值得思考的。不难看出其中含有种族歧视、双重标准的因素。晚清的外交官对此并无思考亦无评论。

三、清末外交官对清末监狱近代化的推动

随着外交官对西方认识的变化，他们不但对欧美监狱的狱制进行公允地描述，进而以称颂欧美狱制的方式来影射我国监狱之不良，甚至还有人猛烈抨击和批判我国传统讼狱制度。“中国之政弊，莫狱为甚。文告既繁，相遁以伪。大讼至系至数年不决，小讼则一听官吏以意为轻重。听断无时。不肖之吏，特刑求狱，动加桎梏；捕役狱卒，皆藉敲剥为生，相倚为奸，而狱官不诘。民未定罪，先受非法刑求，及入狱门，又有狱吏之私刑拷掠。观于外域之狱政，益恍然中国之迁流之失，大远于先王明刑弼教之心。”<sup>[2] (P<sub>357-358</sub>)</sup>通过这些外交官的著述及言行，清朝上流社会开始注意监狱状况，并逐渐接受欧美国家的行刑理念，从而为清末监狱的近代化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外，也有一些清朝外交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清末监狱的近代化改革。郭嵩焘在日记中记述，1878年在“斯多克火恩”（斯德歌尔摩）召开的万国刑法监牢会邀请清政府参加，<sup>[3] (P<sub>264</sub>)</sup>他因此奏陈清廷，“臣去岁过香港、新嘉坡，遍视其系囚处，整齐清洁，叹为尽善。凡所收系，课以工艺，使其出而皆可以谋生，尤服其用意之深厚”，<sup>[11] (P<sub>586</sub>)</sup>并建议“派员赴万国刑法监牢会。”<sup>[11] (P<sub>386</sub>)</sup>虽未成行，但促成1890年清廷首次派员出席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监狱会议”。而戴鸿慈在考察回国后担任了法部首任尚书，提出了对清朝监狱改革的四项主张：“改建新式监狱、养成监狱官吏、颁布监狱规制、编辑监狱统计”，<sup>[12] (P<sub>831</sub>)</sup>并且“采英

美改良监狱之制，于京师筹办模范监狱”，<sup>[13] (P<sub>513</sub>)</sup>为清末监狱近代化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晚清出洋外交官对欧美监狱的考察和认识，逐渐改变了国人对监狱的传统观念，促进了近代监狱制度的西法东效。虽然他们受自身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局限，但他们将改革狱制的思想与国富民强、振兴中华的愿望紧密相连，始终积极地推动清末监狱改良。正是基于此，晚清出洋外交官在中国监狱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铭记和尊重的。

参考文献:

[1] 薛福成.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2] 钱钟书. 王立诚. 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3] 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4] 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5]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6] 载泽. 考察政治日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7] 刘锡鸿. 英轺私记 [A]. 钟书河. 走向世界丛书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8] 赵尔巽, 等. 清史稿 (第15册, 卷14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9] 薛梅卿. 中国监狱史 [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6  
[10] 徐曰彪. 近代香港人口试习 [J]. 近代史研究, 1993, (3).  
[11] 杨坚. 郭嵩焘奏稿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1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3] 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戴鸿慈传 (卷6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上接第14页)酿成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主义特征（政教合一），又有进步十足的现代主义特征（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它将西方学者看来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价值取向（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伊朗政治实践中，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固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使得步履蹒跚的伊朗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又一次处于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认为，不管伊朗政府和伊朗人最终如何选择，这应当是他们的内政，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都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211  
[2] 杨宏山.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发展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64  
[3] J• Rothschil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A]. B• Ben-El-Mechaieq. Legitimacy of Regimes [C].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9. 38  
[4]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 [M].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5] 李荣, 王昕. 从总体选举看伊朗政治动向 [J]. 现代国际关系, 1997, (7): 37.